

第五章 結語

壹、本論文藉《莫斯科二〇四二》分析烏托邦文學體裁之結論， 可為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提供較為明確之界定

過去烏托邦文學的研究，多半將“anti-utopia”（反烏托邦）與“dystopia”（解烏托邦）視為同義詞，但實際上，“anti-utopia”與“dystopia”二者是有差別的。“anti-utopia”是對“utopia”（烏托邦）的質疑，表達反抗、拒斥烏托邦之意；而“dystopia”指惡劣的地方，為“utopia”的反義詞。

本論文對於以往烏托邦文學的歸類也有不同的看法。薩米爾欽的《我們》、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與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向來被譽為二十世紀的「三大反烏托邦小說」，近年來，有部分學者將這三部著作稱為「三大解烏托邦小說」；但就文本的內涵而言，這三部小說著實不應納入同一範疇之中。《我們》與《美麗新世界》勾勒出科技發達、秩序井然的完美社會，在那裡，人們以個人的自由換取幸福的生活；而《一九八四》則描繪了一個既無自由，也無幸福的人間煉獄。顯然，在《我們》與《美麗新世界》中，烏托邦已落實，但作者認為，科技的過度發展，使人類喪失了人性，過分強調秩序則使人類失去自由，然而，他們寧可要多一些自由，也不願要完美，因此，《我們》與《美麗新世界》屬於反烏托邦小說的範疇。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中，並不存在反抗烏托邦的思想，作家所描寫的是一個與烏托邦相反的世界，故《一九八四》屬於解烏托邦小說。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中，極權體制毫無顛破的希望，因此，按西斯克(David W. Sisk)對解烏托邦小說的劃分¹，《一九八四》屬於無望的解烏托邦。

然而，西斯克對解烏托邦小說的分類，卻無法涵蓋俄國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解烏托邦小說。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原先的共產主義解烏托

¹ 西斯克在《現代解烏托邦中的語言轉變》中，將解烏托邦小說劃分為三種類型：無望的解烏托邦(bleak dystopia)、具爭議性的解烏托邦(disputable dystopia)與充滿希望的解烏托邦(hopeful dystopia) (P.168)。

邦遭顛破後，繼之而起的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解烏托邦，因此，《莫斯科二〇四二》為「循環性的解烏托邦」(reduplicative dystopia)。文本中「原生即再生，再生即原生」的思想，也正好呼應著「循環性的解烏托邦」。按「原生即再生，再生即原生」的思想來解讀時間的概念：過去即未來，未來即過去；因此，過去的解烏托邦在未來還會重現，而未來的解烏托邦則是過去解烏托邦的翻版，如此循環不息，便造成了「循環性的解烏托邦」。

貳、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莫斯科二〇四二》之特點

以沃伊諾維奇的《莫斯科二〇四二》，研究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解烏托邦小說，可歸納出下列幾項特點：

一、烏托邦文學之傳承與顛覆

綜觀烏托邦文學的發展史，可以發現烏托邦文學具有反映時代，表現時代精神的功能。烏托邦文學的第一波高峰，出現在地理大發現時期，受時代氛圍的影響，當時的烏托邦小說充滿著對異域的憧憬。十九世紀末，歐美資本主義迅速擴張，造成階級矛盾激化，因而掀起了烏托邦文學的第二波高峰；這個時期的烏托邦小說中，充滿了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與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的懷疑精神為烏托邦文學開啓嶄新的一頁。在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出現了質疑烏托邦價值的反烏托邦小說，以及與烏托邦理想背道而馳的解烏托邦小說。二十世紀後半葉，後現代主義為烏托邦文學注入了新的元素。俄國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莫斯科二〇四二》，繼承了烏托邦文學反映時代的傳統，它以蘇聯社會為藍本，反映出共產政權統治的隱憂，具共產主義解烏托邦的特色。此外，沃伊諾維奇甚至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大膽預言蘇聯終將消亡的命運，後現代主義烏托邦文學不僅能反映時代，也掌握了時代變遷的脈絡。

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烏托邦文學除了繼承傳統，同時也顛覆傳統。烏托邦文學向來以嚴肅的態度，敘述對烏托邦的嚮往或懷疑，而後現代主義的烏托邦文學則具遊戲性特徵，不再強調其贊成或反對的立場。《莫斯科二〇四二》拼貼了許多烏托邦文學中的橋段，並逐一加以嘲諷，它以戲謔的

態度顛覆了以往烏托邦文學話語霸權的地位。

二、「反反烏托邦」思想

沃伊諾維奇稱《莫斯科二〇四二》為「反反烏托邦小說」，其「反反烏托邦」思想正反映出後現代主義的特性。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自許為共產主義烏托邦的莫斯科共和國坍塌之際，反共作家嘉年華洛夫帶領人民，擊潰了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但稍後，這位反共英雄卻自我加冕，成為專制的沙皇，於是，莫斯科再度落入極權主義統治。現代主義浪潮下的反烏托邦與解烏托邦小說中，大多蘊含著濃厚的反極權主義思想，而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莫斯科二〇四二》，則著眼於極權主義消解之後，取而代之的，是否又是另一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因此，反共之後，還要反反共；反烏托邦之後，還要反反烏托邦。

三、狂歡化色彩

後現代主義浪潮下的《莫斯科二〇四二》，在思想、語言等各方面，都流露出鮮明的狂歡化色彩：

(一)去主體化

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不存在永恆不變的事物，也就是主體的消亡。文本中，一手創立莫斯科共和國共產政權的元首格尼亞里西姆斯，最後竟自稱是真正的反共者；共產主義的專制政權垮台後，反共英雄嘉年華洛夫卻又建立起另一形式的專制政權。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所有人、事、物不斷地變遷，不存在絕對的真理。因此，《莫斯科二〇四二》刻意以「原生即再生，再生即原生」的思考，顛覆了「原生即原生，再生即再生」的邏輯。

(二)上下倒錯

《莫斯科二〇四二》以「上下倒錯」的手法，嘲弄了高高在上、不可

一世的人、事、物。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許多崇高的精神意象被轉移到「肉體的低下部位」，例如：在莫斯科共和國中，人民以“К.К.” (кака) 代稱“Классик Классикович”，便是「上下錯位」的表現，象徵著平民大眾對官方價值的貶抑。

(三)多語性

《莫斯科二〇四二》中，除了俄語標準語外，同時也藉由戲擬，融雜了其他不同的語彙，包括外來詞語、復古式的詞彙與烏克蘭的方言²，成就文本的多語性特徵。《莫斯科二〇四二》的多語性，造成眾聲喧嘩，消解了中心語言(此指俄語標準語)的霸權。

(四)語言粗鄙化

粗鄙的語言是造成《莫斯科二〇四二》狂歡色彩的要素。在《莫斯科二〇四二》中，可以見到諸如“кака”(糞便)、“подтирайтесь”(擦屁股)等粗俗、骯髒的字眼，這種「髒話」的使用，展現出狂歡化語言的特色。宏揚「肉體低下部位」的粗鄙話語，向來不見容於傳統文學，但後現代主義卻刻意將其引入文本，企圖填平精英語言與大眾語言間的鴻溝。

《莫斯科二〇四二》的狂歡化語言，造成文本的離心化。而文本中「原生即再生，再生即原生」的概念，蘊藏著俄國後現代主義解烏托邦小說的精神一顛覆烏托邦文學的原創性與權威性。此外，《莫斯科二〇四二》的警世意味更是小說的宗旨所在，正如作者沃伊諾維奇於文末所載：「但願未來的實際情況，不會如我所描寫的這般。」³

² 一九八〇年代以前，烏克蘭語為蘇聯的方言之一，直到一九九一年烏克蘭共和國正式獨立後，烏克蘭語始成為烏克蘭共和國的官方語言。

³ 《Москва 2042》, с.374.